

层层转包赚差价，随意倾倒坑乡村，内外勾结手法隐蔽，掩埋罪证逃避监管

# 跨省排污“生意”给乡村埋下“生态炸弹”

## “拍料”追踪

扫描二维码，看“生态炸弹”偷袭乡村，带来灾难



本报记者赖星、闵尊涛、张璇

有的将1124.1吨硫酸钠废液，分30次从浙江运输到江西浮梁县山洼处倾倒；有的将6罐车具有危害成分的废液从江苏运至江西峡江县，倾倒至乡村水塘……近一个月以来，江西宣判了多起跨省倾倒危废案件。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我国危废产生量逐年增加。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196个大、中城市的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为4498.9万吨，医疗废物产生量为84.3万吨。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在大部分危废得到科学有效处置时，也有少部分危废被跨省非法倾倒、掩埋。这些危废犹如“生态炸弹”袭击乡村，既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又产生了巨额的环境修复费用。

针对非法跨省排污乱象，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指出，既要坚持零容忍、严打击，更要注重源头治理和长效机制建设，坚决防止“生态炸弹”破坏美丽乡村。

### 5个月内非法倾倒危废30次

洞口村位于“国家级生态县”浮梁县，是赣东北一个山清水秀的村庄，一条清澈的小河从中穿流而过。

2021年1月4日，村民们在等待两年多后得知，曾给洞口村造成巨大污染的一家浙江企业被判赔300余万元用于生态修复等，6名相关人员还因污染环境罪被判刑。

村民饶桂生是这起污染事件的受害者之一，他家距河边只有一二十米远，小孙子常常在河畔嬉戏玩耍。2018年7月份的一天，小孙子的皮肤突然多处起泡，并逐渐溃烂，医生诊断之后认为是皮肤中毒引起的。为了给孙子看病，他家花去医药费近万元。也是在那段时间，洞口村的村民发现有外地车辆在村庄附近倾倒不明液体。

“我们用的山泉水突然开始冒起很多泡沫，发出刺鼻的气味，河中的死鱼死虾越来越多，有村民怀疑是河水被污染了。”饶桂生说。

村民们开始着手调查污染源。“有一天凌晨，我跟踪到一辆浙江牌照的大罐车，发现它在排污水。于是，我立马打电话叫了四五个村民将大罐车拦住并报警。”洞口村村民商冬华说。

很快，环保执法人员和公安民警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锁定了犯罪嫌疑人。2018年8月，浙江海蓝化工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吴某民以及吴某良等6人被刑事拘留，其中4名浙江人，2名江西人。

浮梁县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3月3日



从外省运输到抚州市东乡区掩埋的120吨医药废物，给当地生态造成严重危害。

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人民法院供图

至同年7月31日近5个月时间里，这伙犯罪分子连续作案30次，共倾倒硫酸钠废液1100余吨，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损害。经检测，槽罐车内的硫酸钠废水中，叠氮化钠含量为2096mg/L，远超3mg/L的标准值。亲水而居的村民，不得不重新寻找水源打井取水。

随意倾倒污染物，既破坏了环境，还产生了巨额的修复费用。经环保机构鉴定，浮梁县两处受污染地块的生态环境修复总费用为216.8万元。

2020年12月29日，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也宣判了一起跨省非法运输掩埋医药废物案件。来自江苏、浙江等地的四名男子为获利竟然从湖北运输医药废物到东乡区掩埋，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记者近期来到受污染地块，这里曾掩埋了约120吨医药废物，大量危废泄漏而出，产生大量挥发性气体。虽然污染物两年前就已被转移处置，但空气中依然飘散着刺鼻的气味。

2018年6月，我们到达现场时闻到化学药品的气味很浓烈。相关部门经检测后发现，填埋场地检出的镍、苯、三氯乙烯、乙苯均具有毒害性，其中总石油烃超标准值306.94倍。

东乡区生态环境执法监察大队队长李伟说。这起跨省排污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积极开挖处置这些污染物，已花费近300万元。而据有关部门的评估，后期生态修复费用还需500多万元。

### 跨省排污的“生意经”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跨省排污已形成一条日渐成熟和隐蔽的产业链，从产废单位到业务中介，从运输接应到掩埋处置，各环节环环相扣。

——层层转包赚差价，危废处置价格遭“剥皮”。4000元、2000元、1000元、500元，这4个数字背后是一条跨省非法转移处置危废的层层转包链条。“从产废单位到业务中介再转手给填埋处置方，经过层层转包后，一吨医疗废物的处置价格从4000元被压缩到只有正常价格的八分之一，最终只能靠非法倾倒来赚钱了。”抚州市东乡区人民法院法官芳说。

——非法承揽处置业务，随意倾倒坑害乡村。在跨省排污案件中，绝大部分承揽危废处置生意的企业都无危废处理资质。在浮梁

县跨省排污案件中，吴某民明知吴某良没有处理废资质，依然将公司产生的硫酸钠废水交由吴某良处理。根据同伙的供述，有一次在浮梁县倾倒硫酸钠废液后，他们曾将这些废水样品送检化验。化验结果表明，就污染程度而言，这样的50吨废水可以抵得上1万吨生活污水。有同伙告知吴某良这一检测结果，但吴某良仍坚持要将这些废液运到浮梁县进行倾倒。

“由于犯罪分子没有处理危废的资质和手续，他们就用普通的货车或者槽罐车装运危废，有时在深夜把危废运到两县交界处的荒山上倾倒，这样很难被发现。”李伟说。

——内外勾结手法隐蔽，掩埋罪证逃避监管。在一些跨省排污案件中，犯罪分子作案手法日趋隐蔽，往往买通当地人带路，将污染物倾倒在乡村的山洼、河流等隐蔽地带，以掩人耳目。例如，在浮梁污染案中，吴某良每次以1000元的带路费，叫两名江西籍同伙将负责运输环节的李某带到浮梁县寿安镇八角井及湘湖镇洞口村的荒山上倾倒硫酸钠废水。

2020年12月17日，江西省峡江县人民法院也宣判了一起跨省非法倾倒危险废

物案。犯罪分子为了掩盖罪证，竟将6罐车废液直接倾倒至峡江县罗田镇眼头村的水塘中。

### 走出“企业污染、百姓遭殃、政府买单”困境

受访执法人员表示，面对这些外来的“生态炸弹”，他们有时防不胜防，在查处案件过程中面临发现难、处置难、修复难等多重困境。

“这些犯罪分子作案手法隐蔽，很难抓到现行。而且由于不具备专业处置能力，他们采取无序倾倒方式，倾倒危废数量大、品种多、成分复杂、危害性大，带来开挖难度大、鉴定成本高、修复工程大等问题。”李伟说。

而在办案法官陈芳看来，面对巨额的生态修复费用，部分犯罪分子并无能力赔偿，导致此类案件容易陷入“企业污染、百姓遭殃、政府买单”困境。

业内人士介绍，从整体来看，我国在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方面已取得积极成效。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0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显示，2019年，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了危险废物专项治理工作，全国共排查400余个化工园区以及2万多家重点行业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持有危险废物许可证单位的危险废物环境风险，消除环境风险隐患。相比2006年，2019年危险废物持证单位核准收集和利用处置能力、危险废物实际收集和利用处置量分别增长170.9%和109.8%。

针对少数不法分子非法跨省排污乱象，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指出，既要坚持零容忍、严打击，更要注重源头治理和长效机制建设。

首先，强化跨区域危废转移处置监管，建立部门和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加大违法犯罪打击力度。专家建议，充分运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建立危废智能监控平台，让每一种危废都有一个“源代码”，每一次转移轨迹都可追溯，实现辖区内危废底数清、去向明。

其次，通过技术提升，从源头上减量减排。“一方面，对危废的综合利用和处置进行‘提质扩容’，促进专业化、规模化、资源化利用处置危废；另一方面，鼓励企业推广清洁生产，从原料选择、工艺设备改造提升等方面节能减排。”上海一家环保中心的业内专家说。

此外，普及危废知识，提高环保意识。在陈芳看来，许多污染环境犯罪行为人对危废和自身行为后果认识不足，往往因为蝇头小利，而给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要进一步普及危废污染防治知识，做好法律法规政策解读，增强公众法制观念和环境保护意识，共同守护生态环境安全。

# 被打“七寸”后，电信诈骗团伙贩卡手段像贩毒

本报记者毛鑫

涉案银行卡开卡量，从每周上千张锐减到几十张；一张银行卡卖到电信网络诈骗（下称“电诈”）团伙手中，价格上涨了近10倍；贩卡像贩毒一样费尽心思，例如把卡片藏在奶粉罐里运输出境……

2020年10月国务院联席办部署“断卡”行动以来，广东省公安机关迅速行动，打击、整治、惩戒多管齐下，涉“两卡”犯罪出现明显拐点，电诈警情总数和涉诈“两卡”绝对数大幅下降，打击治理成效初显。

“任何一宗电诈犯罪，都离不开‘两卡’。”广东省公安厅新型犯罪研究中心副处长鲍良雄说，“断卡”就是打中了此类犯罪分子的“七寸”。

### 300元购入银行卡，转手就卖3000元

“两卡”是一种广义的说法，主要包括通信类的手机卡、物联网卡，资金类的个人银行卡、对公账户及结算卡、非银行支付机构账户等。

2020年9月，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一家银行网点，开卡数量较多，且存在抱团开卡的情况，引起了警方注意。

办案民警经过排查，发现了一个在黄埔区、增城区及佛山、东莞一带活动的开卡售卡团伙。

该团伙有上级卡商、下级卡商、“卡农”（开卡人）、“卡农”看守人员等具体层级，以招聘兼职为幌子，大肆拉拢一些法律意识淡薄且急需用钱的外来务工人员，让他们来广州办理银行卡，然后再低价购入、高价售出，专门提供给犯罪团伙用于洗钱等违法活动。

2020年10月22日，广州警方统一收网行

动，成功打掉该犯罪团伙，共抓获30名犯罪嫌疑人。

据嫌疑人供述，主犯王某以1500元一套的价格，向卡商韩某收购银行卡。韩某通过小众通联软件或百度贴吧、QQ群发布招聘信息，以及在网吧现场招聘等方式拉拢中介人员，以300至600元不等的价格，诱使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卡农”，使其开通并提供银行卡“四件套”（银行卡、U盾及密码、手机卡、身份证件）。

为确保新开卡能正常使用，该团伙雇佣10多人，将“卡农”暂时看管在小旅馆、小公寓内，便于王某、韩某等人进行银行卡网银登录及支付验证等操作。

验证成功后，王某、韩某等人再将“四件套”和绑定支付宝的手机，以3000元一套的价格出售给上级卡商。根据上级卡商的要求，在这些银行卡、支付宝接收诈骗退款期间，“卡农”需要被继续看押，直到银行卡或支付宝使用完毕。

“利用买卖账户转移诈骗资金，已成为当前电诈的重要手段。”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支付结算处处长陈卫东说，上述案件中，一张银行卡300元购入，转手就卖3000元以上，堪称暴利。

广东省公安厅新型犯罪研究中心处长朱嘉伟说，实名非实人“两卡”的存在，极大地增大了打击难度，也滋生买卖、租售“两卡”的黑灰产业链条。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两卡”违法犯罪产业化趋势日益明显。以手机卡为例，开卡团伙想方设法办理尽可能多的新卡，待价而沽。带队团伙按照收卡团伙的要求，在各类QQ群、微信群等发布收购信息，与开卡团伙交易后收取手机卡交给收卡团伙，后者再层层贩卖赚取差价。

### 2800多名涉案人员被禁用通信业务

2020年9月份，广东率先启动打击治理“两卡”专项工作，并被确定为全国试点。公安机关、人民银行、通信管理局等26个部门，开展联合打击、整治、惩戒。

截至今年1月6日，共铲除涉“两卡”犯罪窝点15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5100人，累计排查关停高危电话号码232万余个、排查管控涉诈风险的个人银行账户530万余个，公开惩戒不良信用通信用户2873人……

“抓住了银行卡的问题，就能真正打到这些犯罪团伙的‘七寸’。”鲍良雄说。

依托厅际联席会议制度，26个部门打通壁垒，数据互通。据鲍良雄介绍，目前相关数据已经初步整合。此外，警银加强合作，由银行安排专人常驻公安机关，全面梳理排查异常开户线索，推动大数据建模。目前已从存量银行账户中发现了580万个高危潜伏账户。

“这些涉‘两卡’犯罪的高危账户，目前已经纳入监管，实施只收不付、不收不付、停止非柜面功能等举措。”陈卫东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轮打击中，广东有2400多人因出售出租借银行账户、个人银行卡等失信行为被惩戒。5年内，这批人只能使用现金消费，不能使用移动支付功能、不能注册支付宝账户和开通微信支付。

还有2800多名涉嫌电诈犯罪人员、涉案号码实名登记人员被列为不良信用通信用户实施惩戒，其名下所有手机号码、网卡等通信业务一律先行关停。

### 有团伙把十几年的老卡都翻出来用了

广东经济活跃度高、人口多、开卡基数大，一直是涉“两卡”犯罪高发地，也是深受电诈危害的地区之一。

端窝点、抓嫌犯、破案件、严惩戒……“断卡”行动开展以来，广东涉“两卡”犯罪出现明显拐点。2020年12月，广东电诈警情总数同比下降11.77%。“这一数据表明，连续4个月的打击治理已初见成效。”鲍良雄说。

2020年12月的数据还显示，广东的新增开户数量已经从全国第一降到全国第五，涉案的银行卡开卡量，已经从每周上千张降至几十张。

涉诈“两卡”绝对数大幅下降，特别是新开银行卡数量大幅缩水，直接导致贩卡难度加大。有案例表明，市场萎缩后，有团伙把十几年的老卡都翻出来用了。

银行卡终端价格也开始大幅上涨。最新数据显示，现在一张银行卡到了洗钱的环节，价格已翻了数倍，达到上万元。“银行卡终端价格上涨，也是打击取得成效的很好证明。”陈卫东说。

“断卡”行动取得实效的同时，犯罪分子也在伺机应变。

首先是用卡洗钱流程缩短，用卡方式改变。涉案银行卡从之前“开卡—收卡—寄卡—洗钱”模式，演变成即开即用即弃、押人开卡转账等形式；从开贩新卡洗钱，逐渐向以盘活、出租出卖存量旧卡洗钱及以贸易对冲形式洗钱转变；从原来利用银行卡转账，逐渐向信用卡转账洗钱转变。

此外，为逃避打击，境内大量诈骗团伙流窜到东南亚地区作案。同时，当地一些涉毒、涉赌等犯罪团伙也有“弃毒弃赌从诈”的趋势，因此仍需要大量的银行卡洗钱，这些卡都是从境内通过多种方式贩运过去的。

“有时候一张卡要寄到边境，手段像贩毒一样隐蔽。有放在奶粉罐里的，还有夹藏走私的。”鲍良雄介绍说。

### 存量卡管理难度或将凸显

尽管广东打击治理“两卡”取得阶段性成效，但面临的总体形势依然严峻，迫切需要拿出实招硬招应对。

电诈犯罪形态比较复杂，涉及资金链、信息流等环节多，取证、溯源难度大。一些现有法律不能很好解决此类案件办理中遇到的难题，致使后续司法处理难度较大。期待立法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加快法律法规更新，或者及时出台司法解释，公布有指导性的司法判例。

部分监管环节还存在责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例如，公安机关的主业是打击犯罪，但受客观形势影响，现在却花很大心力去做行业乱象治理。

鲍良雄说，特别是涉案电话卡方面，还存在社会代理商渠道管理混乱、远程违规开卡等问题以及实名不实人卡、物联网卡等大量用于作案的情况。

记者了解到，以广州移动为例，2018年新增开户900万个，2019年新增开户600万个，2020年新增开户400万个。虽然在下降，但广州每年新增流动人口仅40万左右，哪来这么多新增开户？随着时间推移，新开卡或许越来越少，但存量卡管理还是个难题。